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新意”探微

聂海杰, 卢圣轩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探究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新意”,需将新旧哲学的本质差异作为逻辑前提。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是旧哲学即传统西方哲学的两种形态,它们的哲学观点存在着差异性,但它们共同地作为“形而上学”遵循着同一个带有“柏拉图主义”色彩的理论建制。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彻底性在于:不是在旧哲学的形而上学地基上建构体系,而是要以新哲学取代旧哲学。这一重大哲学革命在内容结构上呈现出双重逻辑:一是对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破除了唯心主义者对“超感性世界”的绝对崇拜,实现了“哲学王国”和“现实世界”的会通;二是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破解了困扰旧唯物主义者的“历史之谜”,实现了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结晶,新唯物主义完成了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根本变革,在理论形态和实践功能上富有“新意”:在理论形态上,新唯物主义呈现出“非形而上学”的鲜明特质;在实践功能上,新唯物主义确立了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有机统一的新哲学观。

关键词: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改变世界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5.05.005

文章编号:2096-9864(2025)05-0034-09

对于马克思通过哲学革命创立了一门新哲学这一事实,国内外学术界鲜有争议;但对于这一重大思想革命之“新意”的认识,人们并未能达成完全的一致,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争议性。造成纷争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关于该问题的运思方式和思维架构。不少人虽然承认马克思哲学同传统西方哲学存在着差别,但他们并未真正地将这种差别视为本质差别。新时代重释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新意”,需基于新旧哲学的本质差别这一思想前提,深刻剖析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

主义在内的旧哲学的彻底变革意蕴。

一、传统西方哲学的理论形态和理论建制

马克思发动的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不是传统西方哲学的地基上建构体系,而是将作为旧哲学的传统西方哲学作为批判对象。因此,探究作为新哲学的新唯物主义的“新意”,需从前提上澄清传统西方哲学的固有症结,即需要对其理论形态和理论建制进行必要的考察。

收稿日期:2024-12-26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3BZX006);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YJS2025KC13);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4-ZZJH-381)

作者简介:聂海杰(1981—),男,河南省开封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卢圣轩(2001—),女,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1. 传统西方哲学的理论形态

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中,涌现出了许多哲学理论体系,由此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根据现有文献记载,泰勒斯最早确定性地将“一切事物的原则”归结为“水”^{[1]50},他由此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人。自此以降,西方哲学踏上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哲学家们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哲学问题,提出了许多蕴含深邃智慧的哲学观点。如若囿于表象,整个哲学史好像是一个“厮杀的战场”:“哲学史的结果所昭示的,不过只是分歧的思想、多样的哲学的发生过程,这些思想和哲学彼此互相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1]22-23}然而在恩格斯看来,围绕着许多问题的争议及其所形成的各种哲学观点,同哲学家们究竟如何应对和解答“哲学基本问题”有着本质联系。何谓“哲学基本问题”?恩格斯基于对西方哲学史发展逻辑的认识,深刻地将之界定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实质上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277}。这一贯穿于全部哲学史之中的“元问题”在内容结构上展现为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2]278}西方哲学家们究竟如何解答这个问题,决定了他们的基本哲学立场及其所建构的哲学体系的性质。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的西方哲学家“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2]278}。“哲学基本问题”在内容结构上同时还蕴含着第二个向度,恩格斯借用西方哲学的语言将之归结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2]278}。同样地,根据哲学家们对于该问题的不同解答,可以将古今西方哲学流派划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深思之,第一个向度所根本关涉的是存在论或世界观层面的问题,界定了西方哲学的两种理论形态:唯心主义

和唯物主义;第二个向度所根本关涉的是认识论层面的问题,界定了西方哲学家们的思维结构的差异性。我们重在考察的是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成果结晶的性质问题,即要凸显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的批判和变革。因此,我们将主要地基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之第一个向度的深刻思想,据此从前提上澄清作为整体的——由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种理论形态构成的——传统西方哲学的本质规定性。

2. 传统西方哲学的理论建制

在肯定西方哲学理论形态的差异性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西方哲学在理论建制上的同一性。所谓“理论建制”是指西方哲学进行哲学运思、建构哲学体系的理论逻辑和运思架构。整体观之,传统西方哲学在理论建制上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质。最先对此作出明确界定的当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这部论著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科学:一种是研究某种“存在者”、有其专门研究领域的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另外一种则与之不同,“这一门学术〈哲学〉的任务是在考察实是之所以为实是和作为实是所应有的诸质性”^[3]。也就是说,这门“学术”不是研究某种“存在者”,而是将全部“存在者”构成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存在者之为存在”的原理。亚里士多德由此成为哲学史上第一位对哲学作出清晰定义的哲学家。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系统论述自身哲学思想的著作进行命名。后人根据这一著作位居物理学著作之后的事实,将之命名为“Metaphysics”,于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哲学”或真正哲学的著作就获得了一个仅仅表示排列位置——“物理学之后”——的书名^[4]。日本学者西周在1874年刊行的《百学连环》讲义中,巧妙借用《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思想,创造性地将“Metaphysics”翻译为“形而上学”。自此以后,人们

就十分自然地将西方哲学称作“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之后,有许多西方哲学家深刻诠释了西方哲学之为“形而上学”的本质规定性,最为著名的当数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深刻地解析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建制的特质,“自柏拉图以降,人们视为自在存在者的,就是超感性之物,后者摆脱和消除了感性之物的变化无常。”^{[5]167}海德格尔明确地将柏拉图作为界标,由此将柏拉图的理念论作为西方哲学的范型,将柏拉图创建理念论的运思逻辑——处理“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方式——作为后世西方哲学家们的基本原则遵循。海德格尔特别深刻地阐释了柏拉图哲学同整个西方哲学的内在联系:“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6]这里陈述了两个事实:柏拉图的思想在决定性的意义上主导着“整个哲学史”的发展;进一步地,作为“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实质上就是“柏拉图主义”。这两个事实具有共同的指向性,揭示了全部西方哲学体系——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这里显然是仅指旧唯物主义而不包括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具有本质同一的理论建制,呈现出十分突出的“柏拉图主义”特质:哲学家们全都以“两个世界”的分离为逻辑始基而将世界形而上学地构造成为对象^[7]。吴晓明^[4]深入分析了海德格尔所分析的西方哲学的理论建制的内涵逻辑:(1)将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分割开来并且对立起来;(2)认为“真理”或“实在”仅属于超感性世界,而不属于感性世界;(3)如果感性世界中的个别事物或多或少可被看作真的或实在的,那么这只是因为它们“分有”了超感性世界的理念。作为西方哲学的“理论内核”,这一带有明显“柏拉图主义”特质的理论建制,具有普遍的规定性,不仅普遍地贯穿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之中,而且也普遍地贯穿于旧

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之中。

从古希腊时代到近代再到现代,所有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都将某种和柏拉图的理念“同质”的“观念”设定为本原,以此为逻辑始基将世界二分为“观念王国”和“感性世界”。就全部唯心主义者而言,哪怕是柏拉图的批判者也绝不否认其作为“柏拉图主义者”的事实。以康德为例,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明确地对柏拉图的理念论提出诘难:“柏拉图也因为感官世界对知性设置了这样严格的限制而抛弃了它,并鼓起理念的两翼冒险飞向感官世界的彼岸……他尽其努力而一无进展”^[8]。这里可以看到,康德对柏拉图一味地沉醉于“超感性世界”的做法给予了批评,他貌似成了一个“反柏拉图主义者”,但事实上,康德只是反对柏拉图的观点,并未颠覆、更未否弃柏拉图哲学的理论建制。康德所实施的“纯粹理性批判”根本地奠基在这个前提之上:先验地界划“物自体”和现象界的关系。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简单地重复柏拉图主义的信条,而是从认识论的维度、以“先验唯心主义”的形式,试图对柏拉图所确立的西方哲学理论建制进行筑基和加固。因此我们看到,就作为传统西方哲学分支之一的唯心主义而言,哪怕是“表面叛逆”的柏拉图的批评者,骨子里也是柏拉图主义者,其所建构的唯心主义体系也必然地遵循西方哲学的理论建制。

作为传统西方哲学的另一分支,旧唯物主义体系的建构为何也遵循西方哲学的理论建制?破解这一疑难,需克服那种将旧唯物主义绝对地视为唯心主义“对立面”的认知的局限性。这种认知虽合理地认识到了二者在哲学观点上的差异性,但遗忘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基于存在论维度,作为“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既包含了唯心主义(以及宗教神学),也包含了唯物主义^{[9]16}。的确,唯物主义哲学家或经验论哲学家在接受了柏拉图的二重世界的基础上则与柏拉图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认

为现象能够提供关于真理的认识^{[9]68-69}。就具体的哲学观点而言,旧唯物主义者关于世界的本原的认识,的确呈现出和唯心主义者不同的特征,前者是将“物质”作为本原,后者则是将“精神”作为本原;前者是将世界构造为“感性客体”,后者则是将世界构造为“思想客体”。一方面,二者的确存在着差异性,对于世界的本原的认识是不同的。但另一方面,不应否认在差异之中内蕴着同一性:二者都是基于某种抽象“观念”并以此为逻辑始基将世界构造为“客体”。因此,和唯心主义者一样,旧唯物主义者也将哲学之思界定为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存在论的真理”^[10],他们建构哲学体系的“阿基米德点”同样也遵循由柏拉图所奠定的西方哲学之为形而上学的理论建制。在此意义上,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二者共同构成新哲学——马克思要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它们因而也是马克思哲学革命予以批判和超越的对象。

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双重逻辑理路

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讲到他和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哲学同旧哲学的本质差异。马克思在1843年写给卢格的信中强调:“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1]64}在这里,马克思特别地批驳了旧哲学的做法:“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11]64}这里的“新思潮”意指马克思行将通过哲学革命而创立的新哲学;以前的“哲学家们”无疑是指传统西方哲学家。马克思在这里不经意地呈现了两种哲学运思的不同特点:前者是将哲学之思嵌入社会现实,革命性地推动世界发生新旧形态的转化;后者则将哲学幽闭于“超感性世界”,并由此将哲学之

思凌驾于“凡俗世界”——社会现实——之上。这两种哲学运思的鲜明对比恰恰反映了新哲学与旧哲学的本质差异。在1845年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关于新旧哲学本质差异的反思达到了理论自觉的境地。他十分明确地将自己要创立的新哲学命名为新唯物主义,并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整个旧哲学:一是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旧唯物主义,直指“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二是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唯心主义,在肯定唯心主义具有旧唯物主义缺失的“能动性”的同时,也否定性地指出了其根本局限性:“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2]499}这表明,马克思要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与全部旧哲学是根本对立的,由此从前提上规定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逻辑理路:既批判意图将哲学之思幽闭于“超感性世界”的唯心主义,也批判意图将哲学建构为关于“感性世界”的“真理”的旧唯物主义。

1. 第一重逻辑理路:批判唯心主义

就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问题意识而言,首先要破除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束缚,因而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便构成了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首要逻辑。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着重探究的是马克思何以在存在论维度对旧哲学实施批判,因此,这里阐述的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主要澄清的是马克思何以克服唯心主义世界观幻想的束缚。纵向地看,马克思这一批判的思想进程开始于大学时期,历经《莱茵报》时期、克罗茨纳赫时期,一直持续到《德法年鉴》时期。

大学时期,在构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的过程中,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唯心主义所固有的症结:将“现实的东西”与“应有的东西”二元对立^{[13]10}。这一发现直指德国唯心主义——特别是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的症结,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所建构的“虚假的体系”同康德哲学的相似性,“体系的纲目近似康

德的纲目”^{[13]13}。更进一步地,这一对立在结构上同柏拉图将“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二元区隔的做法相同,马克思实则由此触及了全部唯心主义体系的理论建制的弊病。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马克思论及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用下述观点表达他自己对现实的态度:理念的独立王国翱翔于现实之上(这个彼岸的领域是哲学家自己的主观性)并模糊地反映于现实中。”^{[13]69}这一深谙柏拉图主义世界观基本架构的洞见,显然内蕴着对唯心主义理论建制的本质规定的深刻认识。《博士论文》深刻地揭示了哲学同世界的统一关系:“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1]76}这一命题蕴含着颠覆唯心主义理论建制的批判性意涵:一度作为关于“超感性世界”的真理的“形而上学”,不仅被拉回“感性世界”,而且确定性地将这个世俗的生活世界作为主题。马克思由此消解了唯心主义者关于“超感性世界”的绝对崇拜,罢黜了其绝对地超越于“感性世界”之上的本体地位;不仅如此,一度被二元区隔的“两个世界”的关系得以统一,这种统一关系不是由哲学家主观地构造出来的,而是实现于哲学的“理性之思”同世界的“现实性”辩证互动的过程之中。

基于此,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始挣脱唯心主义的束缚。这一时期,他撰写了多篇报刊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14]83}。这一转向实质上是从前提上颠覆了唯心主义理论建制的基本架构:确定性地将“感性世界”——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作为哲学的主题,并对德国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进行哲学求解。“1844年在巴黎出版了马克思和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上述的转变在这里彻底完成。”^{[14]83}到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基于世界观层面完成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否弃了唯心主义的理论建制,克服了唯心主义者

耽于玄思的世界观幻象。与此同时,该批判还赢获了积极的建构性的成果,马克思的世界观呈现出超越唯心主义的“新意”。基于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深邃认识,马克思揭示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之间的统一性:立足革命实践建构了无产阶级和哲学的“政治联盟”关系,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2]17}。这里的“哲学”有其特定内涵,它不是指作为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而是意指同唯心主义世界观之根本不同的新的哲学世界观。

2. 第二重逻辑理路:批判旧唯物主义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第二重逻辑理路是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我们决不否认旧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积极影响,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给予了重要的思想启迪。然而这里涉及的并非新旧唯物主义的思想渊源关系问题,而是探究新唯物主义如何实现对作为传统西方哲学分支的旧唯物主义的彻底变革,以此审视新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和超越的理论逻辑。基于这一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阈,通过深耕马克思哲学文本,我们发现:随着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的理论逻辑的深化,其批判的矛头逐渐地对准了旧唯物主义。这在《莱茵报》时期已初露端倪:马克思在罢黜唯心主义者栖居的“超感性世界”崇高地位之际,并未落入旧唯物主义者意图将世界构造为“感性客体”的窠臼。马克思深刻地呈现了“感性世界”作为人们居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之本来面目;不仅如此,他还创造性地将黑格尔那里汲取的辩证法嵌入初步唯物主义化的世界观之中,对作为矛盾体的“现实世界”进行犀利解剖,暴露了其本质结构的“不合理性”。《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唯心主义世界观及其理论建制进行“彻底批判”之际,批判的锋芒愈发明显地波及旧唯物主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肯定费尔巴哈

对宗教的唯物主义批判之际,同时也对作为其逻辑始基的理论建制进行了反思。马克思深刻意识到了费尔巴哈脱离国家和社会对宗教进行批判的非现实性,阐明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15]214}的事实,并由此揭示了“颠倒的世界意识”同“颠倒的世界”的逻辑同构关系。仔细考量,这里已经展现了新旧唯物主义在理论建制上的本质差异。马克思后来对此做了回顾和反思:继费尔巴哈对基督教实施了人本学唯物主义批判之后,“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15]199}。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向世人阐明了其思想发生革命性变革的重要事实:开辟了一条新唯物主义道路,而这条新哲学道路已于《德法年鉴》时期开启。

《德法年鉴》时期之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重心,转换为如何破除旧唯物主义者(也包括唯心主义者)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所谓“历史之谜”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逻辑及其规律之疑难。在这个问题上,作为旧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费尔巴哈对问题的认识程度远逊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16]这就因此为哲学提出了洞穿“历史之谜”的任务。

马克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逐步深入地破解了困扰西方哲学家们的这一谜题。以对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解剖为根据,马克思确立了根本不同于唯心史观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范式:“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2]544}马克思首先论证了历史作为客观实在的本来面目。历史的本质内

核不是某种“精神”或“意志”,而是“物质”即人类社会的每个历史时代、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遇到”的“一定的物质结果”^{[12]544}。作为客观实在的历史,其构成要素包括“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以及“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12]544-545}。马克思接着澄清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所谓“动因”意指“动力的动力”。“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17]357}质言之,正是由于旧唯物主义无法认清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动力”,它才会陷入将“精神”作为历史“最终原因”的唯心史观幻象。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2]544}。革命何以发生?“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2]567-568}。这就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基于历史作为“客观实在”的固有矛盾,澄清了导致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一疑难。马克思进一步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形态演变规律。《德意志意识形态》基于分工的视角,呈现了人类社会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一矛盾推动下,在所有制层面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形态演变。《共产党宣言》更加具体化地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呈现了进入私有制时代之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轨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极其深刻且彻底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形态演变规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8]592}马克思认为,只要人类社会尚未解除私有制的奴役,就只能滞留于深受规律奴役的“必然王国”之内;但人类社会固有的矛盾必将推动着这个“史前时期”^{[18]592}亦即私有制时代走向终结。基于层层深入的求索,马克思破

解了禁锢旧唯物主义者(连同唯心主义者)头脑的“历史之谜”,科学揭示了贯穿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之中的客观规律,因而彰显了新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7]349}的本真要义。

基于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双重批判,马克思实现了对作为“形而上学”的旧哲学的彻底变革和根本超越,建构了哲学同现实世界及其历史发展的统一关系,确立了一种同旧哲学根本不同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运思形式。

三、新唯物主义变革和超越旧哲学的“新意”

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成果和思想结晶,新唯物主义内蕴着变革和超越旧哲学的“新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新旧哲学的本质差异凝结为一句箴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506}据此,马克思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全都归入“解释世界”的旧哲学的行列,宣告新唯物主义是“改变世界”的新哲学。新唯物主义变革和超越旧哲学的“新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理论形态方面,新唯物主义呈现出突出的“非形而上学”特质;在实践功能方面,新唯物主义实现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有机统一。

1. 新唯物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对旧哲学的变革和超越

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西方哲学再到德国古典哲学,各个世代的哲学家们所构建的哲学体系,因其遵循同一理论建制而无一例外地具有“形而上学”的品格。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不仅被西方哲学家们十分自然地作为“哲学”的同义语,而且被作为西方哲学体系之既定的固有的形态。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跳出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地基,在理论形态上呈现出十分突出的“非形而上学”特质。

新唯物主义破除了唯心主义者将“超感性世界”尊崇为“真理王国”的形而上学幻象。“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2]525}新唯物主义牢牢立足于实践,确证了意识和存在的真实关系:作为物质生产生活总体的社会存在是包括形而上学在内的全部社会意识的本源,它们不过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12]525}。据此,新唯物主义打破了唯心主义者关于超感性世界的绝对崇拜,罢黜了其作为真理王国的崇高地位。

新唯物主义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者将世界构造为感性客体、将感性世界作为领地的形而上学幻象。不可否认,旧唯物主义者的确颠倒了唯心主义者的世界观的结构,将哲学的领地从超感性世界置换为感性世界。然而,这种发生于形而上学王国内部的倒转有其根本局限。“在这种倒转的实行过程中,感性之物变成了真正存在者”^{[5]183};然而,这种做法“尽管已经消除了作为真实世界的超感性世界,但还是留下了这个高层的空位,以及一个高层与底层的结构裂口(*Bau - Riß*)——那其实还是柏拉图主义。”^{[5]245}新唯物主义明确地将“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2]530},由此打破了旧唯物主义者对于感性世界的绝对崇拜,克服了这种仅仅在形式上和唯心主义者不同的形而上学幻象。

新唯物主义确立了根本不同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理论建制。就哲学研究的对象而言,新唯物主义牢牢站立在实践立场上,基于人与自然的统一,深入解剖了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性,揭示了贯穿于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就哲学研究的方法而言,新唯物主义“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19],它坚持将唯物辩证法作为根本方法

论;就哲学研究的目的而言,新唯物主义不是要为世界存在的合理性提供哲学证明,而是通过解剖矛盾着的现实世界确证现存现实的暂时性及其朝着更高形态发展的必然性。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哲学运思结构上就形成了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思想可能性^[20],即彻底地实现了对哲学之为形而上学的旧形态的否定。

2. 新唯物主义在实践功能上对旧哲学的变革和超越

新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革新必然推动着其与旧哲学分道扬镳:“马克思与千百年来的传统决裂,把非哲学的问题变成了哲学分析的对象,从而发展了新的哲学观。”^[21]新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观”的“新意”在于,马克思以“改变世界”的新哲学观取代了以往耽于“解释世界”的旧哲学观。

新唯物主义建构了“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的统一关系。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揭示,科学地论证了“旧世界”必将被“新世界”所超越,因而指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马克思基于哲学的高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其趋势的深邃思考,同“把‘批判’本身变成某种超验的力量”^{[12]253}的旧哲学有着根本区别,后者根本上割裂了哲学同世界的关系,幻想以纯粹的“理论批判”主宰历史发展。新唯物主义所确立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原理”,“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8]45}。这些“原理”本质上是“革命的理论”,即关于社会革命规律的理论表达;它不仅源于“革命的实践”,而且为这场由无产阶级主导的彻底的社会革命提供了科学指引。

新唯物主义揭示了无产阶级同改变世界之间的本质联系。在领导和参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处境、地位和

历史使命作了深邃思考。首先,马克思分析了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必要性。每个时代都有无产者,但只有在资本私有制主宰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矛盾的极致化才使得阶级结构简单化为无产者同资产者的对立,才使得全部无产者联合为阶级而成为资产阶级的敌对方。因此,“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2]262}。其次,马克思论证了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必然性。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及其消灭“旧世界”的革命力量,根源于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那种严酷的但能使人百炼成钢的劳动训练”^{[12]262}亦即大工业生产;同时还与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政治素养和卓越领导能力关系密切。再次,马克思阐明了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现实路径。无产阶级命运的改变同“旧世界”——筑基在私有制之上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灭亡内在统一,它只有消灭这个“旧世界”才能消灭自身。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2]543}。马克思基于上述三重维度关于问题的深刻论析,深刻彰显了新唯物主义成为无产阶级在消灭旧世界的进程中建立新世界的思想武器^[22]的实践特质。

新唯物主义揭示了“新世界”革命性地变革“旧世界”的超越意蕴。作为“新世界”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要消灭作为私有制特殊形态的资本私有制,而是要消灭包括资本私有制在内的全部私有制。因而,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实现了对全部私有制形式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要“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23]。因此,随着旧世界走向灭亡,“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24],不仅人类社会将解除私有制的奴役而获得真正的解放,而且人民群众也将作为“新世界”的主人而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

四、结语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极其彻底,深刻地切中了旧哲学之为“形而上学”的本质规定,实现了对整个传统西方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就批判对象而言,它将矛头对准包括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哲学,旨在瓦解全体西方哲学家们进行哲学运思所遵循的理论建制。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性质赋予其理论逻辑以丰富意蕴: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进行双重批判,克服了唯心主义者和旧唯物主义者沉醉其中的形而上学幻想。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所发动的这场重大哲学革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仅在理论形态和实践功能上赋予哲学以全新内涵,而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西方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63.
- [4] 吴晓明.再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J].中国社会科学,2023(5):57.
- [5] 海德格尔.尼采: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6]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82.
- [7] 聂海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311.
- [8] 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
- [9] 强以华,唐东哲.西方形而上学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0]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514.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4] 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90.
-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2.
- [20] 张文喜.颠覆形而上学: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
- [21] 冯章.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5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326.
- [22] 赵长太,聂海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超越意蕴[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9-27.
- [2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27.
- [2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9.

[责任编辑:侯圣伟]



引用格式:聂海杰,卢圣轩.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新意”探微[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5):34-42.